

# 简论跨文化汉字研究

李运富,何余华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 汉字研究除了本文化视域,还应有跨文化眼界。“跨文化汉字研究”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把“跨文化”当作研究方式和视角,即联系外部文化因素研究本文化汉字;另一个是把“跨文化汉字”当作研究对象,即研究处于不同文化环境中的汉字。“跨文化汉字研究”内容丰富,包括跨文化汉字文本及其汉字现象、跨文化汉字传播、跨文化汉字发展、跨文化汉字比较、跨文化汉字教学、跨文化汉字学术史、外来文化对汉字系统的影响等。“跨文化汉字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应该成为汉字学研究、汉字史研究和汉字文化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和重要分支。

[关键词] 跨文化;汉字传播;域外汉字;外语汉字;外来文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 H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18)01-0060-09

## 一、“跨文化汉字研究”的含义

所谓“跨文化”,不同学科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本文化”也会有不同的“跨越”范围。我们所说的“跨文化”是以“汉文化”(有时也扩大为“中国文化”)作为“本文化”参照的,而且“汉文化”还应落实到跟“汉字”相关的文化项。当“跨文化”跟“汉字研究”结合起来时,就有了学科专业上的特定含义。“跨文化汉字研究”可以有两种特定含义,通常可以不加分别,但需要分别时应该明确研究的问题属哪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跨文化”的“汉字研究”,即把“跨文化”作为“研究汉字”的一种方式或视角,理解为“用跨文化的方式或视角来研究汉字”,也就是研究本文化汉字时会涉及另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环境,例如涉及不同民族、不同母语、不同文字、不同国家、不同历史、不同制度等,都属于“跨文化”式研究。因而联系日本文化或朝鲜文化等来研究汉字就是“跨文化”研究,联系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来研究汉字也是“跨文化”研究。第二种含义是“跨文化汉字”的“研究”,即把“跨文化汉字”当作“研究”的对象,也就是对出现于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环境中的汉字进行研究。例如研究日

本汉字或越南汉字等,就属于对“跨文化汉字”的研究。“跨文化”中的“汉字”可能不等于“本文化”中的“汉字”,因为不同文化环境中的“汉字”往往出现变异或所记语言不同,所以“跨文化汉字”中的“汉字”是广义的汉字。“广义汉字”不必符合典型汉字的全部特征(汉语母语者创制、形体呈方块、结构有理据、职用记录汉语),但必须跟汉字有渊源关系。“文化”的多元性与“汉字”的广义化,使得“跨文化汉字研究”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应该成为汉字学研究和汉字史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和重要分支。汉字研究正在走向“跨文化”。

“跨文化汉字研究”与研究主体关系不大。例如一个德国学者研究汉字,如果他像中国学者一样,研究的对象是汉文化范围内的汉字材料,研究方式也限于汉文化的自证,那仍然不算“跨文化汉字研究”;如果他研究的对象是传播到德国的汉字材料,或者他对中国汉字的研究受到了德国文化的影响,研究中体现出明显的德国文化因素,那就属于“跨文化汉字研究”。站在德国文化立场的话,他研究汉文化的汉字对他来说应该是“跨文化”的,但这种“跨文化”不是以“汉文化”作为“本文化”参照,不属于我们界定的“跨文化”范围。至于德国人研

[收稿日期] 2017-10-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今字资料库建设及相关专题研究”(13&ZD129),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历代训诂古今字汇编及数据库建设”(13AYY006)。

究日本汉字,或者日本人研究日本汉字时比较了韩国汉字,那当然属于“跨文化汉字研究”,但决定这种“跨文化”性质的是研究对象而不是研究主体。倘若德国人或日本人对汉字研究的成果本身也成了研究对象,那就可以从“汉字学史”的层面纳入“跨文化汉字研究”的范围了。

## 二、跨文化汉字研究的基本内容

根据学界所进行的跨文化汉字研究实践,并用上述“跨文化汉字研究”的两种含义从学理上归纳总结,我们认为“跨文化汉字研究”应该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 (一)跨文化汉字文本及汉字材料研究

汉字文本指用汉字记录汉语而形成的书写作品,包括纸质、碑刻、简牍、器物等各种载体形式。通常所谓“域外汉籍”或“域外汉字”就是指存在国外的跨文化汉字文本及汉字材料。“域外”无法包含境内的少数民族文化,所以我们用“跨文化”来指称。出现于跨文化环境中的汉字文本大致有四种情况:

1. 原文本的跨文化移动。即产生于汉文化的汉字文本以原样(内容和形式都不变)流传到外国或外民族,其版本(刻本或写本)可能原地还有,也可能仅存于此。

2. 非汉语母语者抄写或改编的汉文化书籍,即内容是汉文化原产的,而文本的文字是非汉语母语者(少数民族或外国人)书写的。

3. 非汉语母语者用汉字创作的文献,即内容和文字都是跨文化实现的。

4. 生活在跨文化环境中的汉语母语者创造的汉字文献,比如在日本工作的华人用汉字写的文章,发表在华文报刊上。

这四种情况的后三种都会受到跨文化环境的影响,其中的汉字是跨文化环境中使用的汉字,跟本文化环境中使用的汉字可能不完全相同,所以具有“跨文化研究”价值。而第一种汉字使用情况不受跨文化影响,实际上只是汉字文本的转移,跟原文化中的汉字文献没有什么不同。这种来自于原文化而存现于跨文化的汉字文本当然具有文献研究价值(包括版本价值和文献传播价值),但对汉字研究而言,只是多了一种汉字材料样本而已,就如同我们的图书馆里多了几本书,其中的文字现象不会超出本文化汉字研究的范围,因而不具有汉字

跨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除非这些文本影响了当地人,使他们学习和掌握了文本中的汉字,那么可以从汉字传播的角度研究这些文本的流传过程和作为汉字传播源的作用。

汉字研究的材料从传世文献扩展到出土文献,现在又扩展到跨文化文献(一般称“域外汉字文献”)。这样说意在强调汉字研究的材料越来越丰富,其实它们的划分标准不同,材料的归属是可以多选的。例如跨文化汉字文献中也有属于出土文献的,在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都发现不少出土汉字文献,有木简、铜镜、青铜器、碑刻墓志等。但这些出土的文物文字就产生或来源而言仍然不外乎上面所说的四种,所以不再单列。

当我们把跨文化存在的汉字文本看作一种静态的文字材料来研究文字的一般理论和现象时,可以不必考虑它是怎么产生的,也就是可以不管它属于上面所列的哪种类型。例如根据日本的《篆隶万象名义》来研究异体字、根据越南汉字碑刻来研究文字通假现象、根据韩国《玉篇》来研究汉字结构、根据新加坡华文报刊研究汉字规范等,都属于“跨文化汉字材料的利用”。如果根据跨文化环境的不同进一步研究汉字属性的跨文化差异,那又可以同时属于运用“跨文化”方法或从跨文化的视角对汉字的研究。

把跨文化汉字文本当作汉字研究材料或者特殊文献来整理和描述的成果很多,特别是东亚汉籍与字典辞书类的搜集、整理、影印和其中汉字现象的描写研究等。如《新撰字镜》(1967)、《韩国俗字谱》(1986)、《类聚名义抄》(1986—1989)、《新罗上代古文书资料集成》(1987)、《篆隶万象名义》(1995)、《倭名类聚抄》(1996)、《越南汉喃铭文汇编》(1998)、《高丽大藏经异体字典》(2000)、《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2005)、《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2011)、《域外汉籍珍本文库》(2008)、《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2010)、《韩国汉文古文献异形字研究之异形字典》(2011)、《韩国汉籍民俗丛书》(2012)、《域外汉字传播书系·韩国卷》(2012)、《韩国礼学丛书》(2012—2016)、《越南汉喃铭文拓片总集》(2013)、《日本五山版汉籍善本集刊》(2013)、《韩国汉文古文献异形字研究》(2013)、《日本汉语教科书汇刊(江户明治编)》(2015)等。还有王平主持的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韩国传世汉字字典文献集成”,王贵元主持的2015年

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藏汉文古字书集成与整理研究”,何华珍主持的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越南汉字资源整理及相关专题研究”等,也将要产出这方面的成果。

这些成果重在汇编、整理和描写,其实还可以进一步从跨文化视角研究这些汉字文本的来源、特点和价值。

## (二)跨文化汉字传播研究

近20年来,汉字的传播研究逐渐被人重视,相关研究的论著在100部/篇以上。就内容而言,这些论著主要是汉字传播历史的描述,很少有人针对“汉字传播”作理论上的探讨,即使陆锡兴《汉字传播史》这样的专著,竟然也没有对“汉字传播”进行明确界定。因此我们只能根据标有“传播”字样的论著来体会归纳人们对“汉字传播”的认识。下面是论述到“汉字传播”事实的一些著作:

胡双宝《汉字史话》(1980)“汉字对其他文字的影响”部分按国别和民族简要介绍汉字传播对其他文字的影响<sup>①</sup>。

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1997)第六章讨论汉字传播,认为汉字传播路线有三条:一条向南和西南,传播到壮族、越南京族,较晚又传播到四川、贵州、云南、湖南等省的少数民族(苗族、瑶族……)。一条向东,传播到朝鲜和日本。一条向北和西北,传播到宋代的契丹、女真和西夏<sup>②</sup>。

周庆生《从初始到盛行:汉字的东向传播——朝日越比较》(2000)将汉字海外传播分为两个阶段:初始传播和大规模引入,并对比三个汉字接受国家朝鲜、日本、越南,分别介绍传入时间、途径、主动接受汉字的积极措施、带来的影响和成果等<sup>③</sup>。

贾春增、邓瑞全《承传与辐射——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2000)第二章“中国语言文字

在海外”分别介绍汉字在日本、朝鲜、越南传播的历史和原因<sup>④</sup>。

张玉金、夏中华《汉字学概论》(2001)第八章“汉字的传播”按民族和国别分节介绍,并总结传播特点和规律,界定汉字文化圈<sup>⑤</sup>。

陆锡兴《汉字传播史》(2002)从空间角度分别描写汉字向西南、向南、向北、向东北、向东的传播历史。既包括向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国家的传播,也包括历史上向中原文化以外的汉族地域传播;既关注受汉字影响形成的新文字,也关注接受汉字的地域、人群如何面对汉字<sup>⑥</sup>。

董明《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2002)分“朝鲜半岛篇”“越南篇”“日本篇”和“宗教篇”四部分,从对外汉语汉字教学角度对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进行研究<sup>⑦</sup>。

日本西田隆雄《汉字是如何向周围传播开的》(2004)认为汉字的传播大致分为中原王朝政策使然和周边国家出于对中国文明的崇敬而主动接纳两种方式<sup>⑧</sup>。

卢士樵、李萍《文字学原理》(2013)有“汉字的传播和汉字文化圈的形成”一章,对部分民族和国家的汉字传播情况作了简要介绍<sup>⑨</sup>。

上述论著有关“汉字传播”的研究,内容不一,表述各异,去重后合加起来,大致涉及这样几个方面(逻辑上具有交叉或包含关系但可能代表作者不同看法的表述分别列出):1. 汉字从中原地区往周边地区传播;2. 汉字分不同路线向各少数民族地区和别的国家传播;3. 汉字从中国向海外或国外传播;4. 汉字传播的历史过程(时间、途径、阶段等);5. 汉字传播的原因;6. 汉字传播对其他文字的影响和受汉字影响而产生的新文字;7. 汉字传播接受方的态度和措施;8. 汉字传播形成汉字文

① 胡双宝:《汉字史话》,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111页。

② 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1—146页。

③ 周庆生:《从初始到盛行:汉字的东向传播——朝日越比较》,收入赵丽明主编:《汉字的应用与传播》,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128页。

④ 贾春增、邓瑞全:《承传与辐射: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北京:开明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0页。

⑤ 张玉金、夏中华:《汉字学概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241页。

⑥ 陆锡兴:《汉字传播史》,北京:语文出版社,2002年版。

⑦ 董明:《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

⑧ [日]西田隆雄:《汉字是如何向周围传播开的》,《言语》,2004年第8期。

⑨ 卢士樵、李萍:《文字学原理》,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3—82页。

化圈;9. 对外汉字教学。

根据这些内容我们很难给“汉字传播”准确定义,但可以抽出几个问题来分析讨论。

1. “传播”应该是一个横向扩散的过程,“横向”具有空间性,所以大都分论著提出了传播的路线和方向;“过程”则具有时间性,所以有人分出传播的阶段和层次。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但就“空间性”而言,如何确定传播起点(传播源)和传播终点(传播目标)是个问题。如果以“中原地区”作为传播源,那非中原地区都可以是传播目标;陆锡兴的《汉字传播史》(2002)就是这么处理的。如果以“中国”作传播源,那只有外国才是传播目标,国内的少数民族地区使用汉字就不能算传播了;许多论著标明“海外传播”“对外传播”等就是如此限定的。而且,传播的“空间性”是指不同的地区,还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或者是不同母语的人群?现在比较常见的是按少数民族和国家来区分,但中国的少数民族有些至今没有自己的文字,有些原来有自己的民族文字,但很早跟汉族融合同化,长期使用汉语汉字,如回族,他们使用汉字跟汉族使用汉字没有不同,那这种是不是汉字传播?就国家来说,如新加坡,80%左右是华人,他们说华语用汉字,而且汉字的规范跟中国一样(采用中国《简化字总表》),这个算不算汉字传播?描述汉字传播还通常按地理位置进行,如“向南传播”“向北传播”等,但中国境内多民族杂居混居的地区不少,国外也有不少“华人族群聚居区”,汉字在这些人群中传播时地理位置难以分割,而且过分强调地域分别的话,那使用汉语汉字的汉族人迁居荒岛能不能算“汉字传播”?可见用地理位置、民族区域或国家来理解汉字传播的空间性,不太容易说清楚传播源和传播目标。我们认为,“汉字传播”的空间性不必拘泥于实体,而可以理解为抽象的“跨文化”:只要跨越了文化界限,即使在同一区域,也算是横向传播;如果在同一文化内部,即使地理位置有变化也不算横向传播。除了民族、国家外,语言也是重要的文化元素,我们可以把母语为汉语而使用汉字的人群当作汉字传播源,而传播的目标就可以是母语为非汉语的人群,那么同一地区同一国家汉语母语者和非汉语母语者之间就可以发生汉字传播。因此“汉字传

播”的实质是把汉字扩展到不同的文化环境中,让本来不属于汉语文化的人接触和接受汉字,而不只是扩大或转移地域。

2. “汉字传播”是个单指概念,只表示汉字从传播源到传播目标的扩散过程,起点和终点都是汉字,接受者接受的是汉字,跨文化影响的也是汉字。就是说,“汉字传播”只限于汉字,不涉及别的文字(非汉字)。但有些论著在讨论汉字传播时会提到非汉字对汉字的影响。如陆锡兴《汉字传播史》(2002)从双向看汉字传播,一方面论述汉字的形成和发展,并考察西方标音文字对汉字的影响,另一方面从空间角度分别描写汉字向西南、向南、向北、向东北、向东传播史。董琨《中国汉字源流》(1998)第九章“汉字与其他民族和国家文字的双向影响”,既包括中国对少数民族或外国文字的影响,也谈到汉字所受的影响<sup>①</sup>。汉字传播到目标地对接受者的文字使用产生影响是应有之事,但非汉字对汉字的影响只能看作非汉字的传播,不宜属于汉字传播,尽管这种影响可能是在汉字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传播”是单向概念,如果要把别的文字跟汉字关联起来讨论,应该属于不同文字的接触和比较问题(见下文),不属于汉字传播问题。汉字在传播过程中如果接触到别的文字,既可能影响别的文字,也可能受别的文字影响。从“接触”的角度解释双向影响现象,比“传播”可能更准确。“跨文化汉字研究”可以涵盖汉字跟非汉字的相互影响和比较研究,研究别的文字时也可以从来源上追溯汉字传播的影响,但“汉字传播”研究可以不管别的文字。所以“跨文化汉字研究”比“汉字传播研究”范围要广得多。

3. “汉字传播”可以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狭义的汉字传播以传播内容的习得、接受和使用为标准,即必须有学习汉字和使用(包括理解)汉字的行为过程。因此如果仅仅是汉字符号或汉字文献流传到某文化范围,而该文化对这些符号或文献没有反应,既不学习也不使用,那就只是流传而不能算传播。“传播”除了“传”,还要“播”,要在那里生根发芽。所以不少学者论述到汉字传播的“接受”问题,是有意义的。如果作广义的理解,那只要不同文化范围内有汉字存在,只要汉字接触到跨文化人

<sup>①</sup> 董琨:《中国汉字源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53—164页。

群,都算汉字传播;甚至不限于汉字本身,与汉字相关的“文房四宝”、书法艺术等的流传也算汉字传播。我们认为,日常交流可以取广义的理解,学术研究最好用狭义的概念。

4. 无论汉字传播如何定义,就研究内容而言,应该包括汉字传播的起因和跨文化范围,汉字传播的起点和终点,汉字传播的途径和方式,汉字传播的时段和过程,汉字传播的内容和物件,汉字传播的接受和效果等。

5. “汉字文化圈”是汉字传播形成的文化范畴,但它强调的不是跨文化之异,而是跨文化之同,即共同使用汉字。因此“汉字文化圈”更像是文化学术用语,而不是能反映汉字属性的汉字学概念。由于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使用汉字的目的不同,使用历史和现状也不同,实际上“汉字文化圈”作为文化学术用语的内涵也难以确切界定,因而它只是个范围提示,不宜看作科学术语。

### (三)跨文化汉字比较研究

要准确认识汉字的特点和汉字的变化,可以在跨文化视野下对汉字进行多对象的接触和比较研究。主要有三种情况:

#### 1. 不同文化环境中的汉字与汉字比较

这里作为比较项的两个“汉字”都是指记录汉语的方块文字。传播使得汉字存现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不同文化环境中的汉字尽管都是记录汉语,也可能发生某些变异。比较不同文化环境中的汉字的差异是汉字发展史研究一个值得重视的观察角度。例如东南亚华人区所使用的汉字跟中国大陆所使用的汉字可能是有区别的,台湾与香港所使用的汉字也不一定全同,中国刻印的汉字书籍与日本刻印的汉字书籍也可能各有特点,汉语母语者创作的汉字文献与非汉语母语者创作的汉字文献更容易产生差异。跨文化存现的汉字的差异可能在形体方面,也可能在结构方面,更多的可能在职用方面<sup>①</sup>。

#### 2. 汉字与跨文化的外语汉字比较

汉字传播的主体当然是汉字,非汉字即使影响

了汉字,也不是汉字传播问题,而是非汉字传播或不同文字的相互接触问题。但有一些文字来源于汉字或受汉字影响而产生,实际上是汉字传播中的变异结果。这些变异的文字就形体特征而言,仍然属于汉字类型(以构件功能组合与呈方块为特征),但它们记录的是非汉语,因而不同于真正的汉字。对这种性质的文字有“准汉字”“类汉字”“汉字型文字”“汉字系文字”“汉字式文字”“准汉字式文字”“变用汉字”等不同叫法,具体的分类和描述很不一致。如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1997)分为两种:1. 变成各种汉字式词符文字,如南方的壮字、喃字,西南的苗、瑶、布依、侗、白、哈尼文字,北方的契丹、女真、西夏文字;2. 变成各种汉字式字母文字,包括日本假名、朝鲜谚文、汉语注音字母、女书、傣傣音节字。日本西田隆雄《汉字是如何向周围传播开来的》(2004)分为正统汉字、变用汉字、变形汉字、派生汉字、疑似汉字5个类型。张公瑾、王锋《汉字型民族文字的造字方法》(2000)认为汉字型民族文字有北方民族的西夏文、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女真文;南方民族的壮文、白文、苗文、水书、哈尼文、侗文、瑶文;周边国家的日文、朝鲜谚文、字喃;还有注音字母和女书虽不是民族文字,但有类似的性质<sup>②</sup>。王锋《从汉字到汉字系文字——汉字文化圈文字研究》(2003)分为南方型汉字系、北方民族汉字系表意文字、表音文字三类。将汉字系文字书写符号构成类型分为假借汉字、汉字笔画字、(汉字)仿造字、汉字省略字、汉字变体字(各种类型可并存于同一种文字中)<sup>③</sup>。赵丽明《变异性·层次性·离合性·互动性——汉字传播规律初探》(2000)认为汉字式文字有日本汉字、朝鲜汉字、喃字、方块壮字、方块苗字、方块瑶字、方块侗字、方块白字、方块布依字、方块哈尼字;准汉字式文字有日本假名、朝鲜谚文、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八思巴字、彝文、

① 形体、结构、职用的关系参见李运富:《“汉字学三平面理论”申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② 张公瑾、王锋:《汉字型民族文字的造字方法》,收入赵丽明主编:《汉字的应用与传播》,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219页。

③ 王锋:《从汉字到汉字系文字——汉字文化圈文字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水书、纳西哥巴文、傣僳文、女书及一些方言字<sup>①</sup>。

以上分类和命名自然各有其合理性,这里不作详细评议。但总体来看名目太多太繁杂,其实这些源自汉字而记录外语的文字可以大别为两种情况:一是完全借用汉字或仿造汉字记录外语。如日本的音读汉字、训读汉字,朝鲜的吏读汉字等。还有完全仿照汉字创造的日本“和字”和朝鲜“国字”等。不管它们的功能的话,就跟汉字没有区别;我们把这种看起来是汉字而记录日语和朝鲜语的文字叫做“外语准汉字”。汉语中也有借用汉字记录外语单词的现象,但这样的“外语单词”属于译音,处于汉语语境,往往已被汉化,被当成了汉语词,所以跟在外语环境中记录外语的准汉字不同,仍然属于“本文化”汉字。第二种情况是利用汉字的形体并参照汉字的构造方法构造出新的本民族文字,它们看起来只是跟汉字相似或相关,其实不只是功能上不记录汉语,形体上结构方式上也跟汉字不完全相同,如记录越南语的喃字,记录壮语的古壮字,记录党项语的西夏文等,我们把这种形体上像汉字而实际上不是汉字的外语文字叫“外语类汉字”。

在外语汉字中,我们认为应该排除“字母文字”或“拼音文字”,如朝鲜谚文、日本假名(片假名、平假名)等。严格说来,这些“字母”是生产“字”的“母”,本身不能记录语言的表达单位,因而不是“字”。它们虽然源自汉字,但实际上只含有汉字的形体元素而完全舍弃了汉字的构件和结构方式,因而不再是汉字。上述有人提到的“方言字”(包括女书)也不应该算外语汉字,因为它们记录的仍是汉语,如果符合汉字的形体特征和构造规则,当归入“汉字”而不必单独立类。

“外语汉字”必然处于“跨文化”环境,本文化的“汉字”和跨文化的“外语汉字”都属于“广义汉字”,因而“汉字”与“外语汉字”的比较仍然可以算汉字的比较。其实不同语种的外语汉字之间也可以跨文化比较,如“喃字”与“古壮字”比较,日本“和字”与韩国“国字”比较等,但它们不是以“汉文化”为参照的,可以暂不纳入“跨文化汉字研究”。

### 3. 汉字与跨文化的非汉字比较

上面我们把源自汉字的日本假名(片假名、平

假名)、谚文等字母文字排除在“汉字”之外,如果拿它们跟汉字比较的话,就属于汉字与非汉字的比较。这种具有渊源关系的汉字与非汉字的比较,重点当然在考察彼此的影响和变化。有些文字外形上像汉字,实际上跟汉字没有直接渊源关系,如古埃及象形文字、苏美尔楔形文字、玛雅文字、纳西东巴文字等,这些非汉字跟汉字比较的时候,就可以不着眼来源和影响,而从形体、结构和职用上分析其异同关系,从而显示出各自的性质和特点。即使外形上不像汉字也非源自汉字的非汉字文字,比如英文、德文、俄文等,同样是可以跟汉字比较的。例如以英文为比较对象的话,英文的外形呈线型,汉字的外形呈块状;英文的结构以“表音构件”为主,汉字的结构以“表意”构件为主;在职用上英文记录英语的“词”,字跟词基本一致,汉字则记录汉语的“音节”,字跟词(语素)不一一对应。这样按不同属性分别比较和描述,汉字与非汉字的差异就清晰明白<sup>②</sup>。非汉字与汉字的文化背景不同,拿汉字跟非汉字进行比较研究,实际上就是从跨文化的视角研究汉字,当然属于“跨文化汉字研究”的范畴,但不必看作“汉字传播”。

### (四) 跨文化汉字的历史研究

这里的“跨文化汉字”只能理解为传播目标地的汉字,也就是传播到不同文化环境中而被接受生存下来的汉字,如日本汉字、朝鲜汉字、越南汉字等。“汉字传播史”通常只研究汉字从传播源到传播目标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也可能有先后的时间关系,但着眼点在横向传播。而传播到目标地之后,这些汉字如何生存、如何发展或者消亡,这个纵向的演变过程,包括跨文化汉字在现代的使用情况,则是一般汉字传播史所不能容纳的。但作为“跨文化汉字研究”,则应该关注传播后的汉字在跨文化环境中的生存变化情况,从而开展“跨文化汉字历史研究”,或者叫“跨文化汉字生态研究”,如日本汉字发展研究、朝鲜或韩国汉字演变研究、越南汉字历史研究、东南亚汉字生态研究等等。

### (五) 跨文化的汉字教学研究

在中外文化碰撞和交流中,通过语言和文字的

<sup>①</sup> 赵丽明:《变异性·层次性·离合性·互动性——汉字传播规律初探》,收入赵丽明主编:《汉字的应用与传播》,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4页。

<sup>②</sup> 李运富、张素凤:《汉字性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学习来了解对方文化是一条重要途径。文献记载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外国人来中国学习汉字汉语,近代西方传教士为了把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也是先学习汉字汉语,再用汉字汉语进行传教的。现代每年全国有十多万留学生,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也有众多的汉字汉语学习者。这种对外汉字教学当然是“跨文化”的,其实也属于“汉字传播”。“孔子学院”设在外国,是汉字传播的重要场所。“留学生”来中国国内学习汉字也是汉字传播的一种方式。因为传播的实质是“人”而不是“地”,只要接受汉字者母语非汉语,就是跨文化的,就可以算汉字传播。

但无论是本文化还是跨文化,汉字教学都是双边的主动行为,而且程式化规范化,教师也可能是非汉语母语者,因而不同于一般的汉字单向传播,所以我们没有把它放到“汉字传播”的专题里讲,而是单列出来讨论。

“对外汉字教学”面对的都是非汉语母语学员,是跨文化的汉字教学,跟本文化的汉字教学有很大不同。比如在形体教学方面,针对英文背景留学生原有的字母先后“时序”感,应该有意强化他们对汉字字根组合的“方块”观念,通过字根在方块中的方位关系掌握字形,因为上下、上中下、左右、左中右、全包围、半包围、斜角对称、偏居一角等布局关系是跟英文形体不同的地方,也是留学生最容易出错的地方。又如来中国学习汉语汉字的留学生大都是成年人,理解能力比中小学生强,如果说在书写方面他们处于劣势,那么对汉字结构理据的学习,可能正是他们的兴趣和优势所在,所以加强汉字构造理据的文化解释,在对外汉字教学中可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对外汉字教学的真正难点还在于汉字的职用,因为汉字的职用很不确定,单字与语言单位没有固定对应关系,一字多用、多字同用成为汉语用字的普遍现象,这是汉字的最大特点。对英文背景留学生而言,学习汉字确实要比学习英文繁难,但难点不在笔画多字数多,也不在字形繁结构复杂,而在汉字职用的不确定,在汉字单位与汉语单位具有多重多向的对应关系。所以跨文化汉字

教学的重点应该是汉字的职用<sup>①</sup>。

#### (六)外来文化对汉字系统的影响研究

汉字的发展演变除了汉字本体属性自身的因素外,还受到外部文化因素的影响。外部文化不限于本族本国“汉字之外”的文化,还应包括不同民族不同国家跨文化性质的影响。在世界文化的相互接触和交流中,非汉族文化特别是非汉语对汉字系统的影响是值得注意的。如接触印度佛教文化之后,因翻译佛经需要就创制了大量原来没有的汉字,译音用的“口旁字”(如嚧)就是在原有汉字基础上加“口”旁作为译音标志而新造的,“切身字”(如翰)也是按照反切原理用两字组合而成的新字,这些译音专字都是按照一定方法成批构造的。还有些表意性的佛教新造字对汉字和汉语系统产生的影响更是深远,如“塔”“魔”等沿用至今,而且可以参与构造新词。汉字系统受日本文化的影响也很多,有些汉字其实是从日本直接借入的,如“腺、吨、吋、脛”等首先是日本为对译外语词而造的。其他如朝鲜渔业的交流催生了“鲛、鲔、鰩、鰻、鮓、鮓、鮓、鮓”等大批记录外来物种的新字,欧洲化学的传入也催生了“锗、铈、镉、铀”等200多个表元素的新字。少数民族文化对汉字也有影响,如《辞海》所收的“峒”“峒”“峒”等字来源于古壮字,《正字通》所收“逃”字异体“逃”来源于侗字和布依字等。还有宋代外交官孙穆所编《鸡林类事》用汉字对译朝鲜语,南宋陈元靓编《事林广记》中记载许多非汉源的少数民族事物词语,明朝四夷馆编《华夷译语》用汉字对译的语言包括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百、暹罗等,以及近代对西方科技和史地名词的翻译用字,都能反映外来文化对汉字系统的影响。所以研究汉字需要有跨文化的眼光,要联系不同文化背景来分析和解释汉字系统的构成和变化。

外来文化对汉字系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新的字符,或专造新字(包括改造已有字符),或吸纳外源汉字,从而使汉字的构形系统和功能系统更为丰富完善。二是扩大原有汉字的记录职能,或兼用原有汉字,或借用原有汉字,从而

<sup>①</sup> 李运富:《汉字的特点与对外汉字教学》,《世界汉语教学》,2015年第3期。

使汉字的字词对应关系更为复杂多样<sup>①</sup>。

#### (七)“跨文化汉字研究”学术史研究

“跨文化汉字研究”的理论框架是我们提出并论证的,但有关跨文化汉字研究的实践却早已有之。总结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分析提炼其中蕴含的理论方法,评价其优劣得失,属于跨文化汉字学术史的研究。除了国内的有关研究(如前文提到的诸多“汉字传播史”类的著作),还应特别关注其他国家的学者立足他们的文化视角来研究中国汉字的成果,如日本和欧美一些汉学家对汉字的研究。正如美国汉学家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所说:“虽然我们是外国人,不可能像中国学者在那种传统的熏陶下知识渊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有所贡献。这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对各种研究材料来说都是新的,也有别于那些研究同一材料的中国学者。”<sup>②</sup>芝加哥大学教授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也指出:“(西方汉学家)他们对中国古文字学与出土文献学的兴趣亦由来已久,至今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成果屡出,尽管这些成果无法与中国国内古文字学界的研究成果相比,但是也不容忽视。在甲骨学、金石学及简帛学诸学科上,西方学者都有独到的见解,促进了中国学者重新思考某些传统说法。至于西方学者对中国古文字学研究整体上的贡献,最重要的是他们所强调的方法论问题。”<sup>③</sup>西方学者出于他们自身的文化视角,研究汉字时关注的重点、分析问题的思路确实存在很多独特之处,值得中国学者借鉴。我们可以把这些外国学者对汉字的研究纳入跨文化汉字研究的视野,从学术史的角度进行再研究。近来出版的张大英《欧美〈说文〉学研究》(2015)就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进行跨文化评价的研究<sup>④</sup>。

### 三、跨文化汉字研究的发展前景

如上所述,“跨文化汉字研究”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完全可以成为汉字研究的一个独立领域或方向,其发展前景令人乐观。

首先,要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这篇文章限于篇幅,仅仅是提出问题,各方面简单涉及,尚未深入探讨。其实还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研究,例如“跨文化汉字”与“汉字文化”“汉字传播”“域外汉字”“域外汉籍”等概念的关系,“广义汉字”的界定和分类及其与“汉字文化圈”的关系,“汉字传播”与“汉籍流传”及“文化传播”“文化交流”的关系,跨文化汉字的单向、双向和多向关系,少数民族区域的汉字传播与国外汉字传播的关系,汉字传播的途径、方式和影响,汉字在域外的生存状态及制约因素,跨文化汉字研究的内容和体系,跨文化汉字研究的学科属性和学科定位,跨文化汉字研究与普通文字学、比较文字学及特种文字学的关系等等,都需要作专题的和系统的论述。

其次,要建立共享的资料中心和专业的研究平台。跨文化汉字研究是一个新的领域,是汉字研究从传世文献、扩大到出土文献、再扩大到域外文献的发展趋势带来的必然选择。就研究的材料而言,目前呈零散分置状态,散布于世界各地,研究利用极为不便。可喜的是这种局面正在改变。韩国庆星大学韩国汉字研究所已着手筹建“世界汉字图书馆”,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也正在筹建“汉字传播博物馆”。前者主要收集现代学者的汉字学论著及相关作品,并在线向全世界开放。后者主要收藏历史上汉字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汉字文献和汉字文物,包括流传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和世界各地的汉籍,以及在少数民族地区和世界各国新产生的各种汉字文献。“汉字传播博物馆”集资料收藏、学术研究和展览交流为一体,除文献资料室和文物储藏室外,还将设置各种展厅和专业研究平台,如“汉字传播研究所”“汉字传播演示厅”等。类似的研究平台或资料中心应该得到政府和学界的支持,使其有条件进一步完善和扩展。

第三,要有稳定的研究队伍和组织机构。一个新的学术领域的开辟、维持、规范、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需要有比较稳定的研究队伍来从事,需要

① 李运富、何余华:《论朝鲜文化对汉字系统的影响——以中国古代字书所见为例》,《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② 转引自李学勤:《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艾兰文集》总序),见《艾兰文集》之一(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③ 夏含夷:《西方汉学家中国古文字研究概要》,《简帛》,第九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0月版,第394页。

④ 张大英:《欧美〈说文〉学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有大家认可的学术机构来组织和规划。现在世界范围内与跨文化汉字研究相关的机构很多,如韩国汉字研究所、越南汉喃研究院、上海交大海外汉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财经大学域外汉字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语言文字研究所、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还有韩国汉字研究所和华东师大联合创办的“世界汉字学会”等。这些机构和组织都从某些方面为跨文化汉字研究作出了贡献。但大都属于“兼”而为之或就某些“特定”材料和“特定”范围为之,也大都属于“各自为战”,缺乏宏观理论指导下的全面布局和系统研究,缺乏彼此间的统一联盟和长效合作,没有形成具有确切内涵的“跨文化汉字研究”特色和协同互助的合力。“世界汉字学会”的参会人员体现了“国际化”,但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理论和方法并没有形成“特色”,所以跟“中国文字学会”的区别实际上仅仅是人员范围的不同,而不是研究取向的不同。因此我们希望能够成立一个具有“跨文化汉字研究”鲜明特色的专业性机构,可以作为中国文字学会的下属组织,也可以成为独立的国际性组织。该组织应该旗帜鲜明地倡导汉字研究的“跨文化方法”,或以“跨文化的汉字材料”作为研究对象,协同世界各国的相关机构,团结志趣相合的学术同

道,有计划地围绕“跨文化汉字研究”组织各种学术活动。

第四,要开展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跨文化汉字研究”无论是研究资料还是研究人员都分布在全球各地,所以国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就十分重要。有了共享平台和组织机构,就有了国际交流合作的基础。但交流合作不是口号,不能只停留在计划中、协议上,而要有实际的内容和看得见的成效。资源共享、人员互访、会议合办、项目同做、发表互助,需要通过不同形式一项项落实。交流才能相互了解,合作才能彼此共赢。在全球化合作共赢的背景下,汉字研究的跨文化和国际化是容易达成的。

第五,要服务于国家发展。“跨文化汉字研究”既是汉字系统、汉字历史和不同文化区域汉字传播的本体事项,也跟“文化强国”“文化走出去”和“一带一路”等国策紧密相关。所以“跨文化汉字研究”不仅要借助“跨文化”来研究汉字,也要借汉字来研究“跨文化”和推广“汉文化”。“跨文化汉字研究”可以而且应该为国家的“一带一路”文化建设服务。

第六,要产出“跨文化汉字研究”系列成果。包括跨文化汉字研究理论与方法系列,跨文化视域的汉字本体系列,广义汉字或外语汉字系列,汉字传播史系列,域外汉字发展史系列,还要有汉字源地与汉字传播地的文化交流系列等。

(责任编辑 宋媛 责任校对 宋媛 蒋重跃)

## A Study on Cross-Cultural Chinese Characters

LI Yun-fu, HE Yu-hua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NU,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a local cultural horizon,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 needs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cross-cultural Chinese character research” has two meanings; one is treating cross-culture as a method and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that is, studying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other is treating “cross-cultural Chinese character” as an object of the study, that is, studying Chinese characters in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s. The “cross-cultural Chinese character research” is rich in content, including the literature of the cross-cultural Chinese character and the phenomena in them, the cross-cultural spread, development, comparison and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 the impact of foreign culture on Chinese character system, the cross-cultural Chinese character academic history and so on. Therefore, the “cross-cultural Chinese character research” has promising future and should be a special field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Chinese character studies.

**Keywords:** cross-culture; spread of Chinese character; overseas Chinese character; foreign Chinese character; foreign culture influence